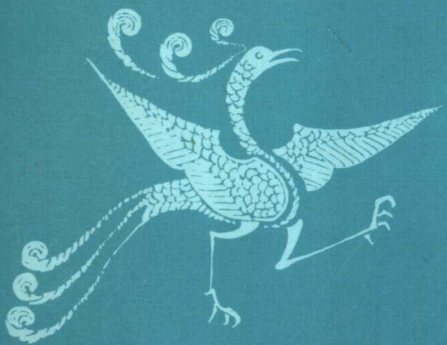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著述与宗族

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



何明星
著

本书借助张舜徽先生对600部清人文集研究的成果，通过对清人文集的编刻方式的统计分析，及与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刊活动的比较，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清人图书文化活动在宗族传承、科举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的轴心作用，揭示传统著述、编刊与宗族是一种相互适应的文化生态关系。1860年之后的印刷技术变革打破了这种生态关系，对著述、出版以及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迄今尚存。探索现行制度与传统文化积累之间的转换与对接，对当代图书出版事业有很大帮助。

中华书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著述与宗族

——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

何明星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何明星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9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5883-3

I. 著… II. 何… III. 古籍-版本-社会学-研究-
中国-清代 IV.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0423 号

书 名	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
著 者	何明星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2 ³ / ₄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883-3
定 价	26.00 元



何明星,生于1964年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在民族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目前供职于高等教育出版社。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研究,曾有《将阅读变为享乐》、《图书品牌价值的评估与测算研究》、《图书消费行为的特殊性研究》等二十几篇论文被《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新华文摘》等期刊发表或转载。

责任编辑：周 旻

封面设计：周 玉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	5
第一节 别集的概念与源流	5
第二节 别集的著述与编撰	7
第三节 清人别集综述	10
第四节 宗族的概念界定及其起源、发展、演变	12
第二章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600 部文集 编辑出版方式的统计分析	19
第一节 为先人先师编刊方式概述	20
第二节 自编文集与立言不朽	22
第三节 为同里乡邦编刊概述	26
第四节 编辑为业概述	34
第三章 清人著名科举家族的著述出版活动考察	35
第一节 清代状元著述编刊情况分析	35
第二节 清代著名科举家族的著述编刊情况分析	37
第四章 清人学术活动的宗族化特征	52
第一节 子承父业的学术活动与著述出版	53
第二节 兄弟相继的学术活动分析	87
第三节 同里乡邦的学术活动研究	95
第五章 清人学术著述出版、传播与学术活动宗族化	105
第一节 学术活动宗族化的再认识	105

第二节 学术活动宗族化的图书文本价值	112
第三节 中国传统图书价值观的当代意义	115
 第六章 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撰、传播与清人文集	
出版活动的比较分析	125
第一节 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撰及其历史特征简析 ...	125
第二节 族谱的编撰、传播与清人文集	
编刊活动的对比分析	135
 第七章 现代与传统之间——清代图书出版史的基本判断	144
第一节 变革,从 1860 年开始	145
第二节 被大大低估的一场技术革命	169
 结 语	172
 附 录 600 部清人文集名录	177
 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00

导 论

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端时间,断定是从太平天国之后,他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中写道:“太平天国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正式展开,此后史学家在所有的层面上——从思想以及经济——都必须将现代化过程纳为分析对象。”^①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分期。尽管学界尚未有定论,但这个分期的启示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大大提前了。如果从太平天国之后的1860年算起,时至2006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已经达到146年。这对于现代与传统的接缝处的一切探索,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图书出版活动是一个多维线索交结的重要结点,它具有历史与当下的交融性质,这种交融性使每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等显性因素往往遮盖图书出版的本原价值。文化出版活动,正如水与容器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同人群、不同场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容器装水,方形、圆形、椭圆形等等不一,木桶、铁桶、瓷碗、玻璃、水晶材质不同,河水、泉水、茶水、酒水等水质有别。社会结构、制度、法律的刚性规范造成了茶杯与水桶的不同,道德、传统、伦理等精神文化追求,导致了泉水与河水的水质差别。同时,容器的大小、材质、形状不等于水的形状,河水、泉水、茶水、酒水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全部代表水的性质。对于清代文集著述、编辑、刊刻的社会学探索,就是尝试着探索图书这种文化思想的物化载体,与清代政治、经济、技术等刚性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

著名学者钱存训先生在系列专著、论文中,从纸张的技术、方法、用途和印刷技术的起源、发展、用料等图书载体角度,对中国传统纸张、印刷技术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奠基性成果。其中,对清

^①[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代图书印刷技术的研究成果,对本书极有补益。钱先生通过对影响文字记录发展的因素的研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不断发展的技术,如“印刷术并没有改变书籍的形式、内容、材料,以致创作的质量。印刷术虽使书籍的产量增加,传布广远,但并不一定就增进书籍内容的高度和深度。甚至今日的计算机时代,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著作,其体例、规模和创见能超越二千年前书于竹帛上的经典”,“我们没有看到一部历史著作……超出司马迁所创作的纪传体所包含的面、线、点而统盖历史全面的写作方法”^①。其实,对这个问题钱存训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命题,即学术思想的创新与出版印刷技术之间是否密切相关?如果有,是一种什么关系?从文化出版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学术思想的创新问题确实还未有人尝试。我们仔细寻找钱存训先生在1962年提出该论点之后的文献资料,也没有发现正面结论。

在当代国内出版史研究领域,武汉大学的曹之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肖东发教授成果丰硕。曹之教授的《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中国典籍编撰史》,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对迄今流传的中国图书典籍的编撰、刊刻动机一一做了研究揭示,并按照中国历史年代顺序对各代图书编撰、印刷给予总结,确实体大思精。曹之教授对清代图书出版的动机研究,发人深思,列举了包含清人在内的落第著书、困厄著书、毁家刻书的大量史迹,表明“立言不朽”思想与实现这种思想的载体——图书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内在联系,它超越了现世的财富与金钱欲求,与人生目标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人对图书、文字的超越性价值认识和宗教般的神圣态度,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殊的图书出版、传播文化传统。曹之教授的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但停留在事例的揭示方面,目前还没有看到对各个时代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面世。

肖东发教授侧重从印刷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古代图书出版,有《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和《插图本中国图书文化历史》两本著作问世,从版本、校勘和印刷文化的角度谈到了古代图书出版的动机和价值认识。其中,肖东发教授在前一本书中提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叔孙豹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观,这也是一种历史

①[美]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163页。

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命脉。中国人的理念,人生不仅是一生一世,也是生在上下古今的历史绵延之中。上有父母祖先,下有子孙后代,既要开创又要积累。叔孙豹之三不朽说也是早期图书文献内容的反映,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及石刻文字中,相当数量都带有上告慰祖先,下昭宣后世之意,其后又化为重文崇著的优秀传统,以著述立言,以著述为荣,以著书传世,是历史文化人亘古不易的情结。”可以说肖东发教授看到了立言不朽对中国图书文化的影响,也提出来这个命题,但没有进一步专题研究立言不朽的人生思想追求何以能够长期存在中国知识学人心底?其现实的支撑基础是什么?今天的中国知识学人是否还有古代中国人的那样浓厚的立言追求?

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时期著述、编撰、刊刻的研究,在作品的版本、目录等研究著作里能够找到非常丰富的成果。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的研究在图书古籍的版本考据方面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他在1994年出版《宋板书叙录》中,列举了宋代图书的跋、叙、撰、前言、后记中提供的大量可供分析图书出版目的、动机的例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祝尚书先生从1986年开始,整理出版了《宋人总集叙录》和《宋人别集叙录》(上下),加上中华书局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万曼先生的遗著《唐集叙录》,大量丰富的个案为本书研究清人文集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提供了历史佐证。

在钱存训先生的研究中,多次提到汉语文字的千年连续性,保障了中国古今图书思想内容之间的有效传递,是世界出版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本书相信,除了文字、语言之外,这种千年连续的奇迹,还与中国传统图书文化独有的出版特征——以宗族为中心的文化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认同本书开篇所引用的艾尔曼的观点,中国从1860年开始迈入现代化进程,那么,从此之后的一百多年,属于传统与现代的接缝处,也正是宗族化共同体整体淡出图书加工、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历史的蝉蜕时期。

本书借助张舜徽先生对600部清人别集研究的成果,对清人文集的编刻方式进行统计分析,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清人图书文化活动在宗族传承、科举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的作用,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人图书生产、销售和出版都体现明显的宗族化特征,图书的手工生产加工、销售系统与学术研究是一种相互适应的文化生态关系。著述、编撰、刊刻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冀图书文字实现“立言”,从而达到人生不朽的理想。这种超验性的伦理提倡,依托中国社会结

构的核心——宗族共同体而存在。

在1860年之后,随着印刷技术带来的一场革命,宗族整体淡出传统图书加工、销售系统,凝结在图书文本之上的这种超验价值观念也逐步消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反思这种价值观念,给当代图书出版事业在不同媒介载体下精神产品的评价标准、版权、著作权和出版制度设计、管理提供了深刻反思的思想源泉。这种探讨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思考现代专业出版许可制度的文化基础,探索出现行制度与历史累积的文化之间,其内在紧张与和谐的原因。

与图书文本是传统社会的重要结点一样,图书、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仍然是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结点。这个结点维系着中国学术思想、教育科研等社会文化多维方向,山泉水与混浊的河水水质相差千里,而水桶与茶杯的容量不可以水滴计,如何设计完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出版制度,使中国文化重新迸发山泉水般自由的创造力,是中国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前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论文牵涉到清人科举家族、学术活动和有史以来的中国宗族文化活动研究,史料庞杂,线索千头万绪,以本人的学识积累,很难把握全面。好在近代史学界、文献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前人的开拓为本书主旨的实现打下了基础,本书仅仅是一个主要思想的大概论述。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别集的概念与源流

一、基本概念

别集是一个人作品的结集,它是古籍的一大类别。“别”字,古汉语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尚书·禹贡》里,“禹别九州”,别,分开之意,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此处之“别”意为另外,在古汉语中“别”与“另”通用。“集”字,古意为群鸟停在树上,《诗经·周南·葛覃》中有“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后引申为聚集、诗文集子,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因此,别集即是一个人创作、写就的各种体裁的作品结集,即现代人所通常意义上的文集。

别集内容根据作者的学术专长、研究志趣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既有经、史、子的内容,也有诗、赋、碑、箴、颂、谏、传等文学创作,内容往往与作者的生活、工作、交往等紧密相关,它是作者个人的生活轨迹、思想学术、工作资料等百科全书式的汇集。在《四库全书》中,别集的作者有相当的比例是历代官吏、文人、学者,基本上体现了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状态。因此,别集保存了大量时代信息,是最为鲜活的具有时代历史价值的精神产品。

别集的名称,有的以作者命名,有的以内容命名,有的以作者官职命名。

二、别集的起源与发展

对于别集的起源,在《隋书·经籍志》有如下记载: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①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云: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数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尤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②

通过《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和章学诚研究,表明别集这种文人结集活动,起源于汉代,真正具有“别集”之名的时期为晋代。根据曹之教授的考证,考察《汉志》,隶属于“诗赋略”内容的文集,共著录 106 家, 1318 篇。到了《晋书·郭澄之传》才有“所著文集行于世”的字样。最早以“别集”单独列目的,是南北朝时期,梁阮孝绪《七录》始于“文集录”之下有“别集”之目。自此之后,历代各家书目几乎都有别集,与

①《隋书》,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 721 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 296 页。

经、史、子相并列,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最重要的一大类别。《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人别集超过一千种,四川大学祝尚书教授在1997年完成的《宋人别集叙录》中收录了宋人诗集、诗词集、文集、诗文集、诗文词集、奏议集等544种,这些是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的作品。明代印刷技术的繁荣,使刻书更易,“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千顷堂书目》中记载,明代别集约有四千多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别集有4575种,由于清代年代不太久远,大部分别集还能够看到。

第二节 别集的著述与编撰

既然别集是中国传统文化分类的一个重要类别,那么必然涉及到对这个类别产生的过程——著述、编撰、刊刻等文化活动的考察。

一部文集是作者的编撰还是作者的著述,对这两种概念的廓清,标志着文集价值的高低,可以以此对清人文集进行学术价值分类。

最早注意到二者区别的,是清代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中写道:

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①

章学诚所言之比类、纂类、撰述,其意义部分等同于我们现代经常使用的编撰一词。按照现代出版概念,有统一的思想体系,但借助他人研究成果、现成文字资料、文献资料而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形成图书或

^①转引自钱穆:《文史通义·书教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7页。

文章,就是编撰。它分为编辑与撰写两部分。编辑是对现成的作品或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撰写是指按照一定思想就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创作、阐发。编撰与编写、编著、编纂意义基本相同,只是根据使用的对象而有所区别,如大型工具书一般用编纂,图书和一篇文章等用编写、编著。与著述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编撰,章学诚考证了其大致源流: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①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其待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②

按照章学诚的考证,记注为三代之时史官的职业,历史典籍皆为记注。撰述起源于三代以下,三代以前无撰述之官职。清代尚朴学、汉学,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证之学兴盛,但这类属于编撰纂类之作,在章学诚看来,应为“智以藏往”一类,与著述有着本质的区别,“神以知来”的撰述才具有现代著述的部分含意。章学诚之撰述即是编撰,与记注之区别主要在于“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中进一步阐述章学诚之撰述概念时,曾写道:

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于纂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页。

②同上,第49页。

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①

在钱穆看来,从记注到撰述,再到著述,是一个功力、知识不断增加的过程,而其间最重要的区别是性灵、智慧,即章学诚所言的“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对于著述,章学诚曾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

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也,著述之立言者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②

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③

章学诚明确指出,著述就是立言,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思想,并且是在札录、考索等功力基础上才能达到,即“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是否有“道”是著述与札录考索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对于著述、编撰的概念探讨,由于远离本书主旨,因此不做过细探讨。总之,章学诚注意到了二者在文化活动过程中的精神含量有别,应该对之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清代是我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蝉蜕阶段,对著述与编撰之区别的探讨,预示着现代出版制度的萌芽。正是大量的编撰者逐步走向现代,使编辑职业队伍最后出现。在现代图书出版活动中,一本图书一篇文章,是编撰还是著述,表现了不同的文化价值,代表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诸如我国现代实行的著作权制度明确规定,对于完全属于著作权人自己创作、著述的稿酬,一般规定在 70—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438 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卷三·答沈枫堦论学》,引自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439 页。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林秀才》,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439 页。

150元一千字,而一部图书、一篇文章超过30%的文字为引用他人现成的成果,就属于编撰、编著,付酬标准相应降低,在45—70元一千字。现代出版制度从经济利益角度对于这两种文化活动给予了评价。

第三节 清人别集综述

清代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出版业与现代专业出版的过渡阶段。清人的文化学术活动,在传统的土壤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文化发展的萌芽。

首先编撰活动从著述、记注等文化活动中脱离,成为专职为他人从事文字加工或材料整理的编辑活动。现代专业编辑出版制度,即将著述、撰写分离,单独成为一个独立于著述、撰写的编辑行业,并构成具有一定规章、法规、制度的现代出版行业的主体。著述活动的专业化使家族、个体的精神活动,逐步走向专业化的学术、科研集体活动,并日益朝着职业化方向迈进。

其次,在传统图书文化活动中,无论是记注、编撰,还是著述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在中国传统积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大量传统图书文化活动编辑与撰写不分、编撰与著述不分,在章学诚之前是混同并用的。编撰、著述活动,除国家设立的修史机构之外,还没有完全变成一种社会职业,依然停留在士大夫阶层,或者以授业为生的教师等群体的一种业余精神活动层面上。编撰与著述不分,如同刻书与藏书不分一样,著述、编纂、刊刻、藏书通常有一个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这是中国传统图书历史的主要形态,正是这一形态在清代依然存在,形成了以宗族为中心的图书文化活动,因之使清人的学术思想研究得以沿着宗族化的渠道展开。

收入《清人文集别录》中的文集共有600部,它们是张舜徽先生从1100多个目录中搜寻出来,再从中删汰的结果。根据文集名称和内容两方面来看,本书认为,这些作品都属于清代学人的著述作品。理由如下:

从名称上来看,清人文集有的曰集、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有的曰稿、文稿、类稿、从稿、存稿、遗稿,稿中有初稿、续稿,集有正集、别集。有的曰文钞、文录、文编、文略、遗文等,还有的曰辨析、疑辨、小记、杂著,类似笔记,按照张舜徽先生的看法,仍属于文编一类:“如颜